



No. C2015001

2015- 5

为什么是中国？

—— “一带一路”的经济逻辑

Why is it China?

---- Economic Logics of China's "One Belt and One Road" Strategy

卢锋、李昕、李双双、姜志霄、张杰平、杨业伟<sup>①</sup>

---

<sup>①</sup> 卢锋是北京大学国发院教授，李昕是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李双双和张杰平是北京大学国发院博士后研究人员，姜志霄是北京大学国发院研究人员，杨业伟是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通讯作者地址：卢锋，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100871，[fenglu@nsd.pku.edu.cn](mailto:fenglu@nsd.pku.edu.cn)。感谢北京大学苏建文同学的助研支持。

## 内容简介

作为东亚与欧洲“中间广大腹地国家”共同谋求发展的宏大规划，中国倡导的“一带一路”包含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等广泛系统的合作内容。“一带一路”是中国新时期全方位扩大开放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凸显出更加重视与广大发展中国家携手共进谋发展的清晰指向，传递出做长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短板”以培育全球经济新增长点的新思路，体现了开放国策、外交战略、结构调整、促进增长目标之间良性互动关系。中国现阶段生产能力在常规制造与建造方面具有比较优势，在开放宏观经济领域拥有充裕的国民储蓄与外汇储备资源，通过共建“一带一路”中国将有机会向世人展示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可靠得力的合作发展伙伴，中国也将通过与广大发展中国家共谋发展而获得广泛利益。

“One belt and one road (OBOR for short)” is a grand plan initiated by China to promote collaboration among countries in the vast areas between the dynamic economic region of East Asia and the European matured economic region. There are five priority areas of collaboration: policy coordination, infrastructure connectivity, trade promotion, money circulation and people’s understanding. OBOR serves an integral part of China’s new strategy to further opening up to the world in all fronts, conveys a new approach to vitalizing the global economic growth through developing together with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signals a new economic diplomatic policy. The strength of OBOR is underlined by China’s comparative advantage at the current stage in capacity of manufacturing sectors and building of large projects, endowment of huge size of national saving and foreign exchange reserves. OBOR offers China a historical chance to demonstrate that she can play a special role in developing together with developing country. In doing so, China will also benefit in sustaining her own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onsolidating the favorable external environment for her peaceful rising.

## 目录

- 1、亚投行冲击
- 2 “一带一路”的内涵、缘起与背景
  - 2-1、概念内涵
  - 2-2、推出过程
  - 2-3、背景条件
- 3、“一带一路”的多重战略定位
  - 3-1、经济外交新战略
  - 3-2、全球增长新战略
  - 3-3、结构调整新战略
- 4、为什么是中国？
  - 4-1、美国先手棋收效不理想
  - 4-2、中国制造与中国建造
  - 4-3、中国储蓄与中国储备
  - 4-4、合作共赢的经济逻辑
- 5、“一带一路”的影响、风险与应对

## 1、亚投行冲击

2015年中国两会期间代表们热议“一带一路”与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以下简称“亚投行”）议题，3月12日传来英国申请成为亚投行意向创始成员国消息，17日法德意等三个欧元区主要国家结伴跟进，成为轰动全球的财经新闻。后来又有澳大利亚、韩国等20多个国家陆续申请加入。据2015年4月15日中国财政部发布最新信息，总共有57个国家成为亚投行意向创始成员国。<sup>②</sup>美国对中国倡导设立亚投行曾多方抵制，然而除日本外，美国绝大部分重要盟国成群结队加入，成为当代国际关系领域极为罕见的现象。

这一现象在美国也引发主流媒体与重要人士广泛评论。如美国资深国际关系问题专家、彼特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前所长伯格斯坦（Fred Bergsten）3月中旬接受不同媒体采访，公开批评美国政府“抵制亚投行是美国犯下的一个巨大错误——它抵制了一家旨在帮助亚洲满足能源、电力、交通、电信和其他基础设施领域数万亿美元投资需求的银行”。这位美国财政部前高官还认为：“美国很多年来一直催促中国在世界经济中成为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并发挥更多领导作用”，<sup>③</sup>这次消极抵制中国主导设立亚投行，损害了美国在重大外交政策上应当具有内在一致性原则。<sup>④</sup>

美国前哈佛大学校长、奥巴马首任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萨默斯（Larry Summers）教授4月初在《华盛顿邮报》等西方主流媒体撰文，指出中国创建新国际金融机构而美国阻止英国等盟国加入未果，是可与二战后出现布雷顿森林体系比较的历史性事件。他批评美国国会右翼拖延审议IMF份额分配改革方案，左派则从环保等方面阻挠基础设施投资，导致美国正在失去经济领导者地位。在他看来，美国这次应对亚投行政策既是策略失误也是战略错判，提示亟需对美国全球经济战略进行系统检讨。他呼吁把亚投行冲击看作是对美国敲响的警钟，在结束政党争斗、重视中产阶级利益、大力鼓励投资等方面调整政策。<sup>⑤</sup>

美国国际关系委员会的基辛格高级研究员罗伯特·布莱克威尔（Robert D. Blackwill）4月13日在美国《国家利益》上发表文章，称中国必须被遏制，呼吁美国不能再协助中国崛起。这位曾担任美国驻印度大使、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副院长的资深专家，把不久前美国在亚投行问题上的溃败，看作是中国崛起挑战美国全球影响力的最好例证。在他看来，由于历史、战略文化和国内政治等方面的深刻差异，美中对未来亚洲力量平衡有着截然相反、互不相容的看法，因而美国有必要从根本上改变对华战略以制衡中国力量上升。但是这位鹰派色彩浓厚的专家也认为，受制于经济全球化的现实，美国新的对华大战略既不能以遏制为基础，也不能突然放弃长期以来让中国融入国际体系的做法，而是要通过重振美国经济以保持不对称经济优势等五方面措施加以应对。<sup>⑥</sup>

<sup>②</sup> “瑞典等七国正式成为亚投行意向创始成员国”，财政部国际财金合作司，2015年4月15日，[http://gjs.mof.gov.cn/pindaoliebiao/gongzuodongtai/201504/t20150415\\_1217200.html](http://gjs.mof.gov.cn/pindaoliebiao/gongzuodongtai/201504/t20150415_1217200.html)。

<sup>③</sup> Fred Bergsten, “US should work with the 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 *the Financial Times*, March 15, 2015, <http://www.ft.com/cms/s/0/4937bbde-c9a8-11e4-a2d9-00144feab7de.html#axzz3Y2jsO4bF>。

<sup>④</sup> 美国前财政部长保尔森也认为美国在亚投行问题上犯了个不小的错误。他认为美国不应该敦促盟国拒绝加入亚投行，而是应该这么跟中国打招呼：“我们想要与你们合作，向你们在国际标准上提供想法和支持，也可能以观察者角色而非正式成员的角色加入亚投行。”可惜这个错误已经铸成，盟友们也不顾美国的劝说，一个个地加入了亚投行。保尔森对此表示了担心，他认为，奥巴马政府在忙于应对“伊斯兰国”和伊朗等事务的同时，没有指定一个专人负责对华政策，这可能是错误的来源。（卿滢：“保尔森：中国还没那么厉害”，财新网，2015年4月16日）。

<sup>⑤</sup> Larry Summer, “The US may have lost its role as the world's economic leader”, *the Washington Post*, <http://www.businessinsider.com/larry-summers-the-us-has-lost-its-role-as-the-worlds-economic-leader-2015-4>。

<sup>⑥</sup> Robert D. Blackwill, Ashley J. Tellis, “Wake America, China must be contained”, *The National Interest*, April 13, 2015, <http://nationalinterest.org/feature/wake-america-china-must-be-contained-12616>。

如何理解亚投行冲击？亚投行不过是一个新的区域性开发性金融机构。过去几十年世界不同地区用不同方式早已建立了好几个类似机构，亚投行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亚投之所以能在全球范围引发超乎寻常的反响，甚至在美国主流精英层引发焦虑与争论，原因不仅在于亚投行本身的直接功能与影响，而且在于这是中国作为当今最大新兴国主动采取的一次重大经济外交战略，在于其背后是中国与众多国家决心共建“一带一路”的宏大愿景与行动，在于进入 21 世纪以来中国经济追赶加速并伴随全球经济版图快速重构的背景环境。亚投行变局的热点新闻元素看似突兀而起，其根源伟力则根植于当代经济格局的历史性转变，并将成为推动这个进程的重要变量。

因而，从“一带一路”入手认识亚投行冲击现象，为理解当下快速展开的全球经济演变大势提供了一个难得的观察和研究视角。本文初步考察中国倡导“一带一路”战略的经济逻辑。首先简略描述“一带一路”战略的含义、缘起与背景，接着从经济外交战略、全球经济增长、国内结构调整等方面分析“一带一路”的多重战略定位，然后从中国阶段性生产能力结构与开放宏观经济特点角度探讨中国实施“一带一路”战略的独特优势条件，最后讨论实施“一带一路”战略的影响、困难与政策选择。

## 2、“一带一路”的内涵、缘起与背景

### 2-1、概念内涵

“一带一路”全称是“丝绸之路经济带”与“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依据 2015 年 3 月 28 日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务部经国务院授权发布的《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sup>⑦</sup>（下面简称“愿景与行动”），“一带一路”是东亚经济圈与欧洲经济圈“中间广大腹地国家”共同合作谋发展的宏大行动规划。“相关的国家基于但不限于古代丝绸之路的范围，各国和国际、地区组织均可参与”，意在“让共建成果惠及更广泛的区域”。<sup>⑧</sup>

“一带一路”现阶段包含五个重点地域合作方向。丝绸之路经济带重点畅通三条线：一是中国经中亚、俄罗斯至欧洲（波罗的海），二是中国经中亚、西亚至波斯湾、地中海；三是中国至东南亚、南亚、印度洋。将“依托国际大通道，以沿线中心城市为支撑，以重点经贸产业园区为合作平台，共同打造新亚欧大陆桥、中蒙俄、中国—中亚—西亚、中国—中南半岛等国际经济合作走廊”。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重点方向包括：从中国沿海港口过南海到印度洋，延伸至欧洲；从中国沿海港口过南海到南太平洋。“海上以重点港口为节点，共同建设通畅安全高效的运输大通道”。“愿景与行动”特别提到“中巴、孟中印缅两个经济走廊与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关联紧密，要进一步推动合作，取得更大进展”。

“一带一路”重点合作内容则体现为“五通”。第一，中外沿线国家共同协调发展规划与加强政策沟通是共建一带一路的前提。<sup>⑨</sup>第二，沿线国家大力建设基础设施实现互联互通

<sup>⑦</sup> 国家发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务部：“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国家发展改革委网站，2015 年 3 月 28 日，[http://www.sdpc.gov.cn/gzdt/201503/t20150328\\_669091.html](http://www.sdpc.gov.cn/gzdt/201503/t20150328_669091.html)。

<sup>⑧</sup> “‘一带一路’这个提法很有远见，在地域界限上没有严格设定，有灵活性，覆盖相当多的发展中国家”。（周小川：“丝路基金起步运作 不是中国版马歇尔计划”，《第一财经日报》，2015 年 2 月 16 日）。

<sup>⑨</sup> “‘一带一路’战略频获世界点赞，沿线已有 50 多个国家积极响应，并愿同各自的发展战略相互对接，争取实现早期收获成果。……哈萨克斯坦的‘光明大道’、斯里兰卡的‘马欣达愿景’、印度的‘杰出印度’战略也都与‘一带一路’许多内容不谋而合。（陈聪：“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会议：50 多个国家积极响应”，新华网，2015 年 2 月 2 日）。中国与哈萨克斯坦在发展规划对接合作方面呈现凸显。2014 年 12 月 14 日，李克强出访哈萨克斯坦期间与哈总统纳扎尔巴耶夫举行会谈。去年 12 月 14 日，李克强出访哈萨克斯坦期间与哈总统纳扎尔巴耶夫举行会谈。会谈原本是“常规套路”，当哈方介绍正在推进的“光明之路”计划，并表示愿向中国出口铁矿石、农产品等进行合作意向。李克强当即回应：我们为什么不在“光明之

是“一带一路”的优先领域。第三，扩大沿线国家扩大贸易与相互投资实现贸易畅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点内容，第四，通过十大措施促进金融合作与资金融通是共建“一带一路”的关键支撑。第五，沿线国家开展广泛的社会和文化交流实现民心相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社会根基。

## 2-2、推出过程

中共十八大和 2013 年两会完成中国最高权力平顺交接，习近平就任国家主席后在 2013 年博鳌亚洲论坛主旨演讲中提出“一带一路”最初构想，过去两年多来这个构想逐步发展成型与付诸实施，构成观察“一带一路”战略推出过程的基本线索。过去两年多仍属于“一带一路”战略初创时期，具体观察可分为三个阶段：一是提出设想与明确概念的前期阶段，二是制定规划与建立机构的中期阶段，三是推出规划与准备实施的最近阶段。

前期阶段大体是 2013 年春季到秋季，“一带一路”战略完成从初步构想到明确概念的转变。2013 年 4 月，习近平主席在出席博鳌亚洲论坛演讲中指出：“中国将加快同周边地区的互联互通建设，积极探讨搭建地区性融资平台，促进区域内经济融合，提高地区竞争力。”<sup>⑩</sup>这里已凝练表述了“一带一路”战略包含的基本要素和思路：致力于互联互通、创设新融资平台、促进区域内经济一体化等等。

2013 年 9 月习近平主席访问哈萨克斯坦首提构建“丝绸之路经济带”设想。<sup>11</sup>2013 年 10 月习近平主席访问印度尼西亚时提出共建“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并倡议筹建亚投行。<sup>12</sup>2013 年 10 月 3 日习近平主席在印度尼西亚国会发表演讲时指出：“中国倡议筹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愿支持本地区发展中国家包括东盟国家开展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建设。……中

---

路”上进行深入的产能合作呢？此前一个月，纳扎尔巴耶夫刚刚在国情咨文中提出了新经济政策“光明之路”计划，其核心是加强本国的道路等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以应对经济下行的压力。李克强的一句建议，将哈萨克斯坦基础设施的巨大缺口与中国富余优质产能对接起来，正好契合了双方利益的交汇点，而引起哈总统的高度兴趣。这场原定交互传译半小时的会谈，也因此不断“加时”，变成了一个半小时的同声传译。次日一早，李克强与哈总理马西莫夫共进早餐时，再次就深化产能合作深入磋商，并初步达成一份涉及基础设施、公路、住房领域的总价值 180 亿美元的大单。一位业内人士对媒体评价说，总理此行“敲定合作项目时间快得惊人、项目大得振奋人心”。随后 3 个月时间，已签约项目规模达到 236 亿美元。从天寒地冻的阿斯卡纳，到春意盎然的北京，当李克强（15 年 3 月）27 日与马西莫夫再次相见并举行会谈时，中哈产能合作已经有了成效颇丰的进展。马西莫夫介绍说，李克强总理去年访哈结束后，哈萨克斯坦方面迅速调整了他们的“光明之路”新经济政策，以便更好与中哈“产能合作计划”对接。两国总理 3 月 27 日当天见证的 33 份重要合作文件，更是涉及钢铁、有色金属、平板玻璃、炼油、水电、汽车等广泛领域的产能合作。对于下一阶段如何深化合作，李克强总理提出三条建议：一是便利产能合作的相关人员往来，开设“特殊通道”。二是在合作早期以中方人员为主的基础上，加大对哈方工人的技能培训。三是为相关项目提供更好的金融支持。对李克强的“经验之谈”，马西莫夫听得特别专注。他说：“前不久中国召开‘两会’，我认真阅读了您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在当前背景下，只有实施产能合作，才能推进中哈两国经济取得‘新突破’。”在李克强看来，“产能合作”并不仅是中哈两国抵御经济下行压力的良方，也会为与相关国家类似合作提供“范式”。在与马西莫夫的会谈中，他明确表示，中方希望中哈产能合作不仅有利于中哈两国，也希望成为一种双边合作的新模式。他说：“我们下决心把哈萨克斯坦作为一个互利共赢的合作‘样板’，探索中国和其他国家的进行产能合作的新模式。”马西莫夫说，去年您在哈萨克斯坦首次提出“产能合作”的重要概念，感谢中方首选哈萨克斯坦进行这种新模式的合作。“这几个月，总有其他国家领导人询问我们和中国的产能合作是怎么搞起来的？能不能和我们也进行这样的合作？”马西莫夫风趣地说，“我总是告诉他们，等我们先和中国合作好了，基于和中国合作的经验再跟你讲。”（“中哈产能合作：李克强务实外交‘新样本’”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2015 年 3 月 29 日）

<sup>⑩</sup> 习近平：“同创造亚洲和世界的美好未来——在博鳌亚洲论坛 2013 年年会上的主旨演讲”，新华网，2013 年 4 月 7 日，[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3-04/07/c\\_115296408.htm](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3-04/07/c_115296408.htm)。

<sup>11</sup> 习近平：“弘扬人民友谊 共创美好未来——在纳扎尔巴耶夫大学的演讲”，新华网，2013 年 9 月 7 日，[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3-09/08/c\\_117273079.htm](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3-09/08/c_117273079.htm)。

<sup>12</sup> “习近平同印度尼西亚总统苏西洛举行会谈”，新华网，2013 年 10 月 2 日，[http://news.xinhuanet.com/2013-10/02/c\\_117587755.htm](http://news.xinhuanet.com/2013-10/02/c_117587755.htm)。

国愿同东盟国家加强海上合作……，共同建设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sup>13</sup>

2013 年 10 月李克强总理在出席第 16 次中国—东盟(10+1)领导人会议讲话中也提到，考虑到本地区有些国家改善基础设施条件需要解决融资问题，中方倡议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sup>14</sup>2013 年 11 月通过三中全会《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要求“加快同周边国家和区域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建设，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形成全方位开放新格局”。<sup>15</sup>至此，中国最高层已明确提出“一带一路”战略。

2014 年前后紧锣密鼓地制定规划与筹创相关机构。依据公开报道信息，有关部委和国务院至少召开三次专门会议，研究、部署和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工作。2013 年 12 月，国家发改委和外交部联合召开“一带一路”建设座谈会，陕西、广西等西部 9 省区市与江苏、福建等东部 5 省人员参加，研讨一带一路建设具体思路设想。<sup>16</sup>2014 年 10 月 10 日，国务院在西安召开了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座谈会，讨论部署有关具体工作。<sup>17</sup>2015 年 2 月 1 日，中共中央常委、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在北京主持召开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会议，安排部署 2015 年及今后一段时期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重大事项和重点工作。<sup>18</sup>媒体报道“一带一路”领导小组的高规格“一正四副”名单：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担任小组组长，四名副组长分别为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王沪宁、国务院副总理汪洋、国务委员杨晶和国务委员杨洁篪。<sup>19</sup>

同时积极进行机构创新，创设“两行一基”。2014 年 10 月 24 日，中国等 21 个首批意向创始成员国的财长和授权代表在北京签约，共同决定发起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sup>20</sup>11 月 4 日习近平主席提出“要以创新思维办好”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与丝路基金，明确“发起并同一些国家合作建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是要为‘一带一路’有关沿线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提供资金支持，促进经济合作；设立丝路基金是要利用中国资金实力直接支持‘一带一路’建设。”<sup>21</sup>2014 年 12 月 29 日丝路基金正式注册，2015 年 1 月 6 日召开了第一次董事会，标志基金开始运作。<sup>22</sup>2014 年 7 月 15 日，中国、巴西、俄罗斯、印度和南非在巴西

<sup>13</sup> 习近平：“携手建设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在印度尼西亚国会的演讲”，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网站，2013 年 10 月 3 日，[http://www.gov.cn/ldhd/2013-10/03/content\\_2500118.htm](http://www.gov.cn/ldhd/2013-10/03/content_2500118.htm)。

<sup>14</sup> 李克强：“李克强总理在第 16 次中国—东盟（10+1）领导人会议上的讲话”，新华网，2013 年 10 月 9 日 [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3-10/10/c\\_125503937.htm](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3-10/10/c_125503937.htm)。

<sup>15</sup>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新华网，2013 年 11 月 16 日，[http://www.sn.xinhuanet.com/2013-11/16/c\\_118166672.htm](http://www.sn.xinhuanet.com/2013-11/16/c_118166672.htm)。

<sup>16</sup> “国家发展改革委与外交部联合召开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座谈会”，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网站，2013 年 12 月 16 日，[http://www.ndrc.gov.cn/xwzx/xwfb/201312/t20131216\\_570632.html](http://www.ndrc.gov.cn/xwzx/xwfb/201312/t20131216_570632.html)。

<sup>17</sup> “张高丽在西安主持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座谈会”，新华网，2014 年 10 月 11 日，[http://www.sn.xinhuanet.com/2014-10/11/c\\_1112786033.htm](http://www.sn.xinhuanet.com/2014-10/11/c_1112786033.htm)。

<sup>18</sup> “张高丽：努力实现‘一带一路’建设良好开局”，新华网，2015 年 2 月 1 日，[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5-02/01/c\\_1114209284.htm](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5-02/01/c_1114209284.htm)。

<sup>19</sup> “‘一带一路’领导班子‘一正四副’名单首曝光，联合早报网，2015 年 4 月 5 日，来源：新华网）。

<sup>20</sup> “21 国签约决定成立亚投行 搭建亚洲互联互通新平台”，新华网，2014 年 10 月 24 日，[http://news.xinhuanet.com/ttgg/2014-10/24/c\\_1112967382.htm](http://news.xinhuanet.com/ttgg/2014-10/24/c_1112967382.htm)。

<sup>21</sup> “习近平：要以创新思维办好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中国新闻网，2014 年 11 月 6 日，<http://www.chinanews.com/gn/2014/11-06/6759286.shtml>。业内人士观察，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欧洲投资银行等五大发展银行，其年度贷款占认缴资本比例，高的如欧投行达到近 1/3，低的不到 10%。据此估计亚投行未来正常运作后每年贷款规模应在 300 亿美元之内。（张涵、罗瑞兴：“业内称亚投行每年最多贷 300 亿美元 注重长远利益”，《21 世纪经济报道》2015 年 4 月 7 日。）

<sup>22</sup> 周小川一次媒体访谈中详细介绍了丝路基金功能定位及其与亚投行关系。大家都知道商业银行是做贷款业务的，多边开发银行也主要是做贷款融资的。近年来，多边开发银行，包括区域性的多边开发银行出现了一些变化，虽然像过去一样主要做贷款，但是，有一部分开始涉足直投这样的投资方式。比如，世界银行过去做贷款，同时有一小部分业务是减贫和援助性的，后来它的国际金融公司（IFC）也做直投。泛美开发银行、非洲开发银行都有类似的尝试。从资金的需求方来看，现在有些项目希望寻找股权投资。就股权

福塔莱萨签署协议，成立金砖国家开发银行，<sup>23</sup>其功能定位与“一带一路”战略也有交集。

2014年11月APEC北京峰会期间，习近平主席在有关演讲中全面阐述“互联互通”：“我们要建设的互联互通，不仅是修路架桥，不光是平面化和单线条的联通，而更应该是基础设施、制度规章、人员交流三位一体，应该是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五大领域齐头并进。”“互联互通”既涉及道路等基础设施的“硬联通”，也包括规章制度方面的“软联通”，还将推动人员流动的“人联通”。<sup>24</sup>

以2015年中国两会热议与3月中下旬亚投行旋涡为标志，“一带一路”引发更为广泛关注。3月5日李克强总理做“政府工作报告”，在第三部分“把改革开放扎实推向纵深”中指出：“构建全方位对外开放新格局。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合作建设。加快互联互通、大通关和国际物流大通道建设。构建中巴、孟中印缅等经济走廊。”在第四部分“协调推动经济稳定增长和结构优化”中要求：“把‘一带一路’建设与区域开发开放结合起来，加强新亚欧大陆桥、陆海口岸支点建设。”<sup>25</sup>两会热议“一带一路”，各省区市有关负责人普遍表示将积极参与“一带一路”规划实施。3月28日三部委授权发布《愿景与行动》，全面阐述中国政府有关共建“一路一带”战略的时代背景、共建原则、框架思路、合作重点、合作机制、中国地区开放态势、中国政府行动，为“一带一路”战略提供了总体

---

投资而言，比较多的是PE (private equity)，通常其投资期限是7~10年，对于一些发展中国家中长期的基础设施建设而言，就嫌短了一些，最好有一部分资金的期限能够到15年或者更长。因此，从项目需求的角度看，存在对比PE期限更长的中长期资金的需求，比如说公路、铁路建设。从资金的供给方来看，由于全球储蓄过剩 (saving glut)，相对而言不难寻找贷款形式的资金，但通常其期限比较短，价格也相对不菲。而私人PE尽管各有差异，但总体而言，期限不容易太长。因此，缺少的是中长期的投资资金。在这样的情况下，就出现了一些期限比较长期的基金，例如一些产油国的基金，其中有私人的，有政府的，也有准政府的，等等。中国可以做一些中长期的、以股权为主的基金。期限可以再长一些，瞄准一些有战略意义中长期项目。同时，股权投资基金也可以和别的融资模式相配合，例如，有了一定股本比例，贷款也就相对容易获得了。在“一带一路”未来会有大发展的背景下，需要将一些可以做出中长期承诺的资金，用于“一带一路”有关的项目和能力建设，包括相关产业的发展，也包括通信、道路等基础设施建设。总之，有这方面的需求，丝路基金也就应运而生了。(丝路基金)是投资周期更长的PE。(对于“那么回报率介于PE和储备之间”问题)，主要是回报期限比较长，从回报率来讲，要求不一定高，但是由于期限长，可以拿到长期的回报。一般而言，一些期限比较长的项目，初期可能拿不到回报，最初几年是宽限期，但到了后期，回报可能会比较稳定。就比如中东的某些基金，也是需要回报的，只不过对回报的需求没有那么急切。丝路基金将来与这类基金也有合作机会。(对于丝路基金是主权财富基金吗)问题?)丝路基金目前未使用主权财富基金的概念。主权财富基金有一定的国家色彩，它强调“财富”的增加，多数主权财富基金在股票、债券、并购上有显著的配置。丝路基金可能会更注重合作项目。当然，也要避免概念上产生道德风险 (moral hazard)，别人说你是主权财富基金，你的钱给我，就算是国家援助了。丝路基金在外还是应大致上看作PE，是回收期限更长的PE。(对于“PE背后一般没有国家战略”问题)，对中国而言，国家战略并非只强调中国的利益，而更加强调对外开放，与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共同发展，也是全球经济未来趋势的重要组成部分。丝绸之路在历史上的意义就是通过贸易发展，实现大家互利共赢，因此，未来丝路基金管理层在选择项目的时候，显然也会建立在互利共赢的理念之上。“一带一路”已逐步在若干国家领导层面上形成战略共识，而对丝路基金来讲，这是投融资的机会。为此，战略是更高层面上制定并推行的，丝路基金则是抓住机会，提供金融支持和服务。(对于“有些人把丝路基金称为中国版的“马歇尔计划”，这是不是一个恰当的提法”问题?)，我认为这个提法不恰当，“马歇尔计划”是二战之后美国特殊地位产物。今天，中国人均GDP约7000美元，位于中等收入国家水平，在全球的情况和当年美国有很大不同。中国的人均GDP在全球才刚刚算是中等收入国家的水平，我们还在努力“奔小康”。因此，从本质上说，丝路基金和“马歇尔计划”不一样。(周小川：丝路基金起步运作，不是中国版马歇尔计划，《第一财经日报》，2015年2月16日)。

<sup>23</sup> “中国、巴西、俄罗斯、印度和南非签署协议成立金砖国家开发银行”，新华网，2014年07月16日，[http://news.xinhuanet.com/2014-07/16/c\\_1111631353.htm](http://news.xinhuanet.com/2014-07/16/c_1111631353.htm)。

<sup>24</sup> 习近平：“联通引领发展 伙伴聚焦合作——在‘加强互联互通伙伴关系’东道主伙伴对话会上的讲话”，新浪网，2014年11月8日，<http://finance.sina.com.cn/china/20141108/224520768110.shtml>。

<sup>25</sup> 李克强：“2015年政府工作报告”，人民网，2015年3月5日，<http://lianghui.people.com.cn/2015npc/n/2015/0305/c394298-26642056.html>。

### 2-3、背景条件

中国推出共建“一带一路”不是偶然的，而是进入新世纪以来特别是后危机时代中国经济内外发展环境发生深刻演变的产物。

第一，新世纪初年中国经济快速追赶与全球增长格局演变客观要求中国提出“一带一路”战略。进入新世纪以后，中国经济基数规模增加，加上巴拉萨效应持续发力伴随人民币实际汇率升值趋势逐步展开，以汇率折算美元衡量的中国经济追赶速度大幅提速，使得中国经济在全球经济版图中地位和影响力空前提升。

改革开放时代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然而如以 2000 年分界把 30 多年分为两个时期，可见进入新世纪后中国用市场汇率折算美元衡量的经济增速大为提升。比较 1978-2000 与 2001-2013 年前后期，后期用本币衡量 GDP 总量年均实际增速是前期 1.03 倍，考虑 GDP 平减指数名义年均增长率 0.89 倍，两阶段增速比较接近。然而用汇率折算美元衡量，后期 GDP 总量与人均 GDP 年均增速相对前期都是两倍多，上述两指标增量水平更是前期八倍多。新世纪中国经济追赶提速远远超出早先国内主流预期。比如 2005 年中国官方对中国经济前景预测认为，到 2020 年中国 GDP 总量将达到 4 万亿美元，人均 GDP 达到 3000 美元。实际上，2014 年中国 GDP 可能首次突破 10 万亿美元，人均 GDP 过 7000 美元。

中国追赶提速是 21 世纪初叶世界经济史的最重要事件，十亿人口量级大国快速追赶快速改变全球经济格局。中国 GDP 全球增量贡献比从 2001 年 8.9% 上升到 2013 年 38.1%，而 2013 年美国全球贡献比趋势值只有 16.2%，其他金砖国为 11.3%，欧元区接近零值，日本贡献为负值。中国资本形成的全球增量贡献比趋势值从 2001 年 17.1% 上升到 2013 年 67.2%，2013 年美国和其他金砖国该指标为 10.8% 和 6.9%，欧元区与日本则略低于零。中国总消费全球增量贡献比趋势值，也从 2001 年 5.3% 上升到 2013 年 28.4%，超过 2013 年美国和其他金砖国该指标的 15.9% 和 14.9%。经验事实显示，中国经济已多年稳定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最大增量贡献国。

后危机时期，发达国家受其深层结构困难制约，或复苏乏力，或仍在衰退边缘徘徊，难以引领全球经济增长。另一方面，广大发展中国家不仅对全球经济增长实际贡献提升，与中国经贸投资联系加深，而且未来经济增长潜力巨大。全新经济格局下，迫切需要中国实施新战略应对上述趋势性转变，更加清晰并具有前瞻性地引领潮流转变，从而达到中国、亚洲以至全球经济持续发展的目标。

第二，中国政府与周边国家以及国际组织在相关领域长期合作努力，为提出共建“一带一路”战略做了必要准备与铺垫。例如早在 1994 年 4 月中国领导人访问乌兹别克斯坦等中亚四国时，就提出了“共建现代丝绸之路，扩大亚欧文化交流”的主张，表示中国愿与中亚各国一道，共同努力“用现代化的铁路把中亚国家紧密地联系起来，并通过这条纽带增进亚欧两大洲之间的联系”。<sup>27</sup>

1996 年，联合国亚太经社会提出了《新钢铁丝路方案》，支持新亚欧大陆桥建设。<sup>28</sup>1998 年 10 月，东起中国上海，西至德国法兰克福，穿过中亚、西亚、东欧、西欧等 20 多个国家，

<sup>26</sup> 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外交部、商务部：“推动共建‘一带一路’的愿景与行动”，新浪网，<http://news.sina.com.cn/c/2015-03-28/140031655780.shtml>。

<sup>27</sup> 大陆桥物流联盟公共信息平台：“新亚欧大陆桥十五年发展历程”，2012 年 7 月 13 日。<http://www.landbridgenet.com/wenku/2012-07-13/1864.html>。

<sup>28</sup> 上世纪 60 年代联合国就提出类似设想，然而受制于当时冷战国际环境未能有实质性推进。

全长 27000 公里，被誉为“现代通信丝绸之路”的亚欧陆地光缆系统全线开通。1999 年 8 月 25 日，中、俄、哈、吉、塔五国元首第四次会晤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中国领导人提出推进地区经济合作与发展，推动复兴古老的“丝绸之路”。2000 年 7 月，由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国家科技部、经贸部、外经贸部举办的“2000 新亚欧大陆桥东西部发展与合作战略研讨会”在河北省秦皇岛市召开。会议就西部大开发与新亚欧大陆桥的开发开放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和探讨，并发表了《秦皇岛宣言》。<sup>29</sup>

2005 年“欧亚经济论坛”在中国西安召开，这个两年一度国际论坛成为中国复兴丝绸之路的重要多边舞台。<sup>30</sup>在 2007 年欧亚经济论坛上，中国与哈萨克斯坦、阿富汗、阿塞拜疆、吉尔吉斯斯坦、蒙古、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 7 国达成协议，宣布 2008 年将投资 192 亿美元在中国与欧洲之间建设一条“现代丝绸之路”，其中 1/3 投资用于中国境内建设，预计 2018 年竣工。<sup>31</sup>2011 年 11 月 18 日，时任中国总理温家宝在印尼巴厘岛出席第十四次中国与东盟领导人会议时宣布，中方将设立 30 亿元人民币的中国—东盟海上合作基金，逐步形成中国—东盟多层次、全方位的海上合作格局。<sup>32</sup>

第三，针对美国后危机时期实施重返亚洲与亚太再平衡战略，中国学界提出“西进”、“南下”等战略思路并展开讨论，对提出“一带一路”构想提供了研究借鉴。上世纪末东南亚金融危机时期，美国拒绝像三年前救助墨西哥那样对泰国施以援手，引发东南亚国家对美国战略关系的痛苦反思，并在客观上对亚洲一体化进程产生倒逼作用。<sup>33</sup>

进入 21 世纪以来，亚太地区在全球范围经济影响力持续上升，并伴随美国与中国在这一区域相对影响力消长。针对这一形势，美国近年大力实施重返亚太与亚太再平衡战略，将其作为美国后危机时代全球战略调整的重中之重。美国在亚太高调增加军事部署，伴随区域内少数国家借机对中国领土提出声索诉求并发起挑衅，对中国维护和平发展需要的和睦周边环境带来不利影响。

据国际关系问题专家的跟踪观察，中国一直从容应对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避免与美国迎头相撞，与美国进行巧博弈，该合作的时候合作，该说“不”的时候就说“不”。更重要的是，中国不随之起舞，而是增加定力，主动进取，综合试策，积极构筑友善的周边环境，化解美国“再平衡”战略压力。一是阐述以中国实现和平发展为中心内容的“中国梦”，并以实现中国梦来统合中国内外战略。二是提出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倡议，加强对中美关系的塑造与引导作用，制衡和化解不利于中美关系长期稳定发展的消极因素影响。三是坚决回应少数国家在有关中国领土主权问题上的无理声索，大力维护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着力

<sup>29</sup> 大陆桥物流联盟公共信息平台：“新亚欧大陆桥十五年发展历程”，2012 年 7 月 13 日，<http://www.landbridgenet.com/wenku/2012-07-13/1864.html>。

<sup>30</sup> 何茂春、张冀兵：“新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国家战略分析——中国的历史机遇、潜在挑战与应对策略”，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3 年 12 月 26 日，<http://fj.rmlt.com.cn/2013/1226/205582.shtml>。

<sup>31</sup> 韩宏：“现代丝绸之路明年开建”，《文汇报》，2007 年 10 月 10 日。

<sup>32</sup> 冯创志：“建设‘海上丝绸之路’是中国南海政策亮点”，中国网——观点中国，2013 年 10 月 4 日，[http://opinion.china.com.cn/opinion\\_84\\_83584.html](http://opinion.china.com.cn/opinion_84_83584.html)。

<sup>33</sup> The US still looms very large in the global economy, but in relative terms it is smaller than in 2008, much less 1998. Those two dates are important because the second of these financial crises bookended a tumultuous decade, further fuelling debates in Asia about overreliance on Western economies and the utility of an intraregional hedge against future volatility. After 2008, many Asian countries have emphasized domestic, intraregional, and emerging market demand. But it was the crisis of 1997–98 that left a particularly searing legacy on many Asian countries. The US was perceived to be disconnected and aloof. Washington refused to bail out Thailand in 1997, just three years after bailing out Mexico. Many in Asia began looking to intraregional solutions. Asia-only currency swaps, Asia-only trade and investment pacts, regional bond funds, and other ideas emerged and evolved during this period. Many of these excluded the US. (Evan A. Feigenbaum, ‘The US must adapt to Asia’s new order’ *Foreign Affairs*, (2 February 2015). Cited from East Asia Forum News Bulletin. )

建设海洋强国。<sup>34</sup>

针对外部环境变化，国际关系学界提出有关“西进”与“南下”战略讨论。王缉思教授认为，在美国战略重点“东移”，欧印俄等“东望”之际，地处亚太中心位置的中国，不应将眼光局限于沿海疆域、传统竞争对手与合作伙伴，而应有“西进”的战略谋划。他建议的主要内容包括：中国应当主动拓展西部与南部周边战略，保持良好的周边环境，分南、中、北三线，加快建设中国主导的“新丝绸之路”。<sup>35</sup>黄仁伟教授认为，中国应该通过亚洲基础设施网络建设，形成亚洲经济一体化的硬件体系；通过“10+1”或“10+3”自由贸易区机制，加强中国市场和亚洲市场的一体化，形成以比较优势为基础的亚洲分工体系；通过人民币国际化，促进与周边发达国家和地区的资本市场一体化。<sup>36</sup>

### 3、“一带一路”的多重战略定位

作为中国最高领导人主创主推的重大政策举措，“一带一路”是中国新时期全方位扩大开放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凸显出更加重视与广大发展中国家携手合作共同发展的清晰指向，传递出通过做长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这块“短板”以培育全球经济新增长点的新思路，动态体现了开放国策、外交战略、结构调整、促进增长目标之间的良性互动。共建“一带一路”契合了扩大开放、睦邻善邻、和平发展、和谐世界等丰富理念内涵，是统筹国内国外两个大局与奋发有为外交新方针的具体呈现。就其经济内涵而言，可以从经济外交、全球增长、结构调整等三重视角讨论其战略定位。

#### 3-1、经济外交新战略

“一带一路”通过扩大对沿线广大国家开放并推进双向广泛务实的经济合作，拓宽和改善中国经济开放发展的国际空间与外部环境，为实现和平发展基本方针提供保障，构成中国新时期大国经济外交新战略。2015年两会期间外交部长王毅指出，2015年中国外交的关键词是“一个重点，两条主线”，其中一个重点就是全面推进“一带一路”。从一个侧面显现“一带一路”成为经济外交新战略。<sup>37</sup>

一国经济外交战略，一般指通过贸易、投资、金融等经济交往合作，扩大加深与相关国家经济一体化联系，在提升本国资源配置与运营效率同时，维护与改善外部经济、政治、安全环境。经济外交在广义经贸合作与外交目标之间建立良性互动关系，从而为一国经济与社会发展提供良好外部保障条件。

经济外交一直是新中国经济与外交工作的重要内容，然而其具体内涵则因体制背景与发展阶段不同而演变。受历史条件制约，计划经济时期中国与前苏联及东欧国家经贸关系一度比较密切，用各种方式对一些亚非拉国家提供了大量援助，与西方国家经济往来最初基本隔

<sup>34</sup> 阮宗泽：“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前景论析”，《世界经济与政治》，2014年第4期。

<sup>35</sup> 王缉思：“‘西进’：中国地缘战略的再平衡”，环球网-观点，2012年10月19日，[http://opinion.huanqiu.com/opinion\\_world/2012-10/3193760.html](http://opinion.huanqiu.com/opinion_world/2012-10/3193760.html)。

<sup>36</sup> 黄仁伟：“美国亚洲战略的再平衡与中国战略优势再评估”，《现代国际关系》，2012年第08期。

<sup>37</sup> 在2015年3月8日上午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举行记者会，外交部部长王毅就“中国的外交政策和对外关系”答中外记者问。王毅表示，2015年中国外交的关键词是“一个重点，两条主线”。一个重点就是全面推进“一带一路”。中国将进一步加强与各国的政策沟通，不断扩大彼此利益契合点。中国会探讨互利合作的有效途径，重点推动互联互通基础设施、陆上经济走廊、海上合作支点的建设。中国还愿意促进人文交流合作，加快自贸谈判进程。中方相信，“一带一路”必将更加深入人心，取得更多的早期收获，助力亚欧大陆实现整体振兴。两条主线就是要做好和平与发展这两篇大文章。中国将同国际社会一道，办好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活动，以史为鉴，开辟未来，使中国成为维护和平的强大力量。中国还将以纪念联合国成立70周年为契机，积极参与联合国发展峰会和国际气候变化合作，推动制定符合广大发展中国家利益的2015后发展议程和新的应对气候变化安排，发挥中国的建设性作用。（王毅：2015中国外交关键词是一个重点两条主线，中国网，2015年3月8日）。

绝，后恢复经贸关系但规模仍很有限，体现当时中国经济外交工作特点与局限。进入改革开放时代，中国经济外交逐步朝内容多样化、对象多元化、机制市场化方向调整转变。中国融入全球经济体系获得阶段性成功，同时也是中国经济外交战略调整转变的阶段性成功，对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发挥了重要保障作用。

进入新世纪特别是后危机时期以来，全球经济格局发生深刻变化，中国经济相对重要性与影响力快速提升，美国实施重返亚太与亚太再平衡战略造成中国周边和外部环境的显著变化。实施共建“一带一路”战略，把中国新一轮扩大开放与贯彻奋发有为新外交方针结合起来，把永不称霸合作共赢方针与共谋发展合作行动结合起来，把睦邻安邻的善意与帮邻富邻的义举结合起来，用置信度更高方式讲述中国和平发展理念，对于营造与巩固有利于中国和平发展的外部环境具有重要现实意义与深远历史影响。在这个意义上，共建“一带一路”的概念、规划与实施，是中国坚定走和平发展道路的最好广告词、宣言书与实践行动。<sup>38</sup>

“一带一路”经济外交战略具有广泛新内涵。首先，从对外开放政策对象拓展与内容提升角度看，“一带一路”从早先主要侧重对发达国家开放，转变为对发达国家与广大发展中国家双重开放并重，并且在大量务实合作领域呈现出对沿线广大发展中国家更为优先的态势，更好体现邓小平 30 多年前提出的“三个方面的开放”全方位开放战略思想<sup>39</sup>。其次，就针对广大发展中国家经济外交内涵演变角度观察，“一带一路”包含“五通”合作重点，将政策、基建、贸易、投资、金融等方面合作内容有机结合起来，形成更为系统与完备的经济外交内容组合与战略架构。再次，针对经济全球化深化与现行国际金融经贸治理结构基本框架不相适应的现实矛盾，依托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发展的务实要求，通过建立亚投行、金砖银行等机构，推动对现行国际金融体制架构的增量改革。

### 3-2、全球增长新战略

进入 21 世纪以来，全球经济增长格局与中国经贸环境的转折性变化，集中表现为双重“重心”转移。一方面，随着中国与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经济增长中相对贡献历史性提升，全球经济增长重心已经从发达国家转向新兴经济体与发展中国家。另一方面，中国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经济联系加强，中国对外经贸增长重心正在从发达国家转向新兴经济体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目前很多发展中国家经济持续增长潜力面临基础设施不足与体制政策局限两方面瓶颈制约，共建“一带一路”有助于推动中国与沿线国家经济持续较快增长，同时也对全球可持续增长提供新的解决思路和方案。

全球经济增长重心转变集中表现为“二八易位”。21 世纪初，全球 GDP 增长构成中，发达国家和新兴与发展中国家分别贡献 80% 和 20%，发达国家中 G7 与其他发达国家分别贡献 61% 和 19%，新兴与发展中国家中金砖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分别贡献 12% 与 8%。到 2010-2013 年后危机时期，全球经济增长构成中发达国家和新兴即发展中国家贡献分别逆转

---

<sup>38</sup> 正如研究人员注意到的，“作为新兴大国，中国面临的外部环境空前复杂。从历史上来看，一个大国在它崛起的进程中会遇到很多挑战，既有来自其他大国的各种疑虑，也有来自小国的担忧、期盼，所以，‘中国威胁论’和‘中国机遇论’交织在一起，这就需要有超强的智慧来处理复杂的外部关系。（马玉荣、王艺璇：“‘一带一路’一大国发展战略——专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隆国强”，《中国经济报告》，2015 年 4 月 29 日）。“一带一路”用真切务实的建设性合作努力，有助于积极回应和化解上述疑虑与疑问。

<sup>39</sup> 1984 年 11 月 1 日，邓小平在中央军委座谈会上讲话中提出三个方向全面开放的重要思想。他说：“我们还有一些人没有弄清楚，以为只是对西方开放，其实我们是三个方面的开放。一个是对西方发达国家的开放，我们吸收外资、引进技术等等主要从那里来。一个是对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开放，这也是一个方面。国家关系即便不能够正常化，但是可以交往，如做生意呀，搞技术合作呀，甚至于合资经营呀，技术改造呀，一百五十六个项目的技术改造，他们可以出力嘛。还有一个是对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的开放，这些国家都有自己的特点和长处，这里有很多文章可以做”。（邓小平：“军队要服从整个国家建设大局”，《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98-100 页）。

为 19% 和 81%。发达国家中 G7 与其他发达国家分别贡献 12% 和 7%，新兴与发展中国家中的金砖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分别为 56% 和 25%，其中中国贡献率约为 35%，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共同贡献率约为六成。十余年间，全球增长贡献份额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实现历史性的“二八易位”。

从出口与对外工程承包的区域结构观察，中国外部经贸环境也在发生深刻转变。中国出口增长结构数据显示，发展中国家已经成为中国增长最快、未来发展潜力最大的伙伴。首先从出口增速看，2013-14 年中国出口增速下降到 7.2%，其中 G7 降到 4.4%，其它发达国家为 7.4%，其他金砖国家只有 6.1%，其他发展中国家仍有 12%，其中东盟最高为 16%。其次从中国出口比重看，2000 年 G7 国家、其它发达国家、金砖国家、其他发展中国家等四类经济体占比分别为 48%、35.2%、2.7%、13.9%，2014 年分别变化为 33.9%、30.8%、6.2%、29.2%，发展中国家份额上升 19 个百分点。最后从出口增量贡献比指标观察，2000-01 年 G7 国家、其它发达国家、金砖国家、其他发展中国家贡献比分别为 46.3%、32.1%、3.1%、18.5%，到 2013-2014 年变化为 24.3%、22.5%、6.4%、46.8%，发展中国家增量贡献率达到 53.2%，绝大部分来自金砖国家以外的广大发展中国家。

另外从中国对外承包工程地区分布看，广大发展中国家也是最重要区域。2013 年中国 1370 亿美元对外承包工程完成额的区域分布数据显示，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欧洲、大洋洲、北美洲分别占 47%、34.9%、9.7%、6.0%、1.5%、0.9%，亚洲和非洲两大洲占比八成以上。承包工程金额最多的十大国家分别为安哥拉、委内瑞拉、沙特阿拉伯、印度、阿尔及利亚、印度尼西亚、尼日利亚、巴基斯坦、越南、埃塞俄比亚等，也都属于发展中国家，共占当年中国工程项目总出口额 36%。

习近平主席 2014 年 11 月 8 日发表题为《联通引领发展 伙伴聚焦合作》的讲话时指出：“如果将‘带一路’比喻为亚洲腾飞的两只翅膀，那么互联互通就是两只翅膀的血脉经络。”<sup>40</sup>以共同发展合作双赢基本理念方针为指导，通过共建“一带一路”破解中国周边与亚洲众多发展中国家瓶颈，将对沿线国家经济较快增长发挥促进作用。借助中国与这些国家动态意义上更为紧密的经贸联系，形成中国与沿线国家携手共进良性互动的新形势。在上述双重“重心转移”背景下，共建“一带一路”有助于培育全球经济新增长点，更好实现后危机时代全球经济强劲可持续增长目标。

### 3-3、结构调整新战略

过去几十年中国改革开放谋发展取得阶段性巨大成就，人均收入从 1980 年代初 200 多美元极低水平逐步提升到 2014 年 7000 多美元的国际中等水平。中国经济未来要实现“双中高”目标，关键在于全面深化改革健全开放型市场经济体制架构，并在此基础上发挥市场机制决定性作用与政府引导作用，持续有效推进中国产业结构、技术结构、区域结构的合规律调整。“一带一路”将为中国经济结构调整提供更为广阔平台与全新环境，成为未来结构调整新战略的重要内容。

随着要素成本与比较优势结构演变，中国产业与经济结构调整必将进一步活跃展开，“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依据各自所处发展阶段不同，也亟需借助资本流动和产能合作推进本国结构调整与经济发展。共建“一带一路”将扩大中国与沿线国家在不同行业以及特定行业上下游之间投资范围，推进投资便利化进程以降低投资壁垒，通过共商共建各类产业园与集聚区探索投资合作新模式，从而为中国与沿线国家产能合作与产业结构调整升级提供广阔平台。

<sup>40</sup> 习近平：“联通引领发展，伙伴聚焦合作”，人民网，2014 年 11 月 9 日，<http://cpc.people.com.cn/n/2014/1109/c64094-25997795.html>。

过去十余年中国实施“走出去”战略，截至 2013 年底共有 1.53 万个境内投资者在境外设立了 2.54 万家境外投资企业，分布在全球 184 个国家和地区。仅华为一家企业，已在 160 个国家和地区开展业务。在“一路一带”战略的支持下，我国企业“走出去”步伐将进一步加快，特别是交通运输、基础设施建设、装备制造、基建原材料等多个行业将从中直接获益。<sup>41</sup>习近平主席 2014 年 11 月 9 日在 2014 年亚太经合组织(APEC)工商领导人峰会主旨演讲中指出，“预计未来 10 年中国对外投资将达 1.25 万亿美元。”以中国目前劳均资本量作为参照，1.25 万亿美元投资估计能给广大发展中国家创造数以千万就业岗位。

李克强总理在 2015 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加快实施走出去战略。鼓励企业参与境外基础设施建设和产能合作，推动铁路、电力、通信、工程机械以及汽车、飞机、电子等中国装备走向世界，促进冶金、建材等产业对外投资。实行以备案制为主的对外投资管理方式。扩大出口信用保险规模，对大型成套设备出口融资应保尽保。拓宽外汇储备运用渠道，健全金融、信息、法律、领事保护服务。注重风险防范，提高海外权益保障能力。让中国企业走得稳、走得远，在国际竞争中强筋健骨、发展壮大。”

中国与沿线国家产能合作的一个重要领域，是中国一些劳动密集型产业或产业区段，随着工资、地价等不可贸易要素成本上升，将逐步转移到处于较低经济发展阶段的发展中国家。如同中国上世纪 80-90 年代曾经利用承接这类劳动密集型行业国际转移获得重要开放发展机遇一样，未来承接这类行业的沿线发展中国家，有可能在外汇创造、非农就业岗位创造、各类人力资源素质提升、推进经济外向度与国际化方面获得巨大利益。当代国际产品内分工深化与全球供应链扩展演变的大量经验事实显示，顺应比较优势规律，依托市场机制作用，产业与产业区段的国家动态转移能为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发挥巨大推动作用。

实施“一路一带”战略，要求我国银行与金融机构更大规模“走出去”提供跨境金融服务。如业内专家指出的，“企业‘走出去’的步伐要迈得更稳、更扎实，离不开金融的大力支持。‘走出去’企业在境外的投资、经营活动，需要依赖银行的信用及资金支持作为坚强后盾；当面临国际金融市场风险时，亦需要银行等金融机构提供避险方案，帮助企业防范和化解风险。”因而需要加快相关政策调整，创造适宜的政策和市场环境，提升银行和金融机构跨境服务能力。<sup>42</sup>

---

<sup>41</sup> 马蔚华：“鼓励商业银行在‘一带一路’战略下服务‘走出去’企业”，中国贸易金融网 2015 年 3 月 3 日。

<sup>42</sup> 2015 年两会期间，原招商银行行长马蔚华就此提出四点建议：第一，进一步放松相关管制政策，提升商业银行跨境金融服务能力。建议简化商业银行在境外设立分支机构及并购的审批核准手续，鼓励支持其在“一路一带”沿线国家和地区进行业务布局。同时，为鼓励商业银行对企业在“一路一带”区域内的项目提供融资和担保，可对符合条件的项目贷款适当调低风险权重，扩大商业银行短期外债指标，并将对外承包工程保函风险专项资金、出口优惠买方信贷等支持政策扩展至股份制商业银行。第二，加强货币市场基础服务能力建设，为商业银行金融创新提供稳健支撑。在“一路一带”沿线，有众多使用小币种货币的国家和地区，企业在境外的投资经营会面临更大的货币兑换及汇率风险管理需求，建议持续加大清算结算、银行间拆放、货币兑换交易、市场定价机制等基础能力建设，加快跨境人民币清算系统对接和业务处理规则惯例的制定；在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有管理浮动汇率制度基础之上，推动汇率风险管理工具创新，如增加韩元、泰铢、林吉特以外的小币种对人民币的直接报价，满足企业规避汇率风险的多样化需求。第三，推广资本项目下跨境人民币试点政策，促进企业境外投融资的本币化。在稳步推进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的方针指导下，可着力培育以本币计价和结算的跨境债权、股权交易市场。具体而言：可继续扩大境内机构通过离岸人民币市场进行筹融资（如发行海外人民币债券）的范围；简化人民币跨境担保项下的境外筹融资以及对应的资金回流审批手续；扩大跨境人民币贷款的试点范围，等等。由此进一步提高离岸人民币市场的活性，拓宽跨境人民币双向流通的渠道，为企业境外投融资本币化提供金融支持和保障。第四，加快人民币离岸金融服务体系建设，加强以分账核算为基础的服务能力建设。在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分账核算体系的基础上，尽快培育建立起丰富、完善的人民币离岸金融服务体系，以市场化手段支持实体经济“走出去”，以多样化模式推动金融创新，从而进一步提高人民币国际化地位和运用广度，为企业“走出去”创造更加完备的货币环境。（马蔚华：“鼓励商业银行在‘一带一路’战略下服务‘走出去’企业”，中国贸

“一带一路”战略将给中国边疆地区经济发展带来全新机遇，为中国国内区域经济结构调整注入新动力。就“一带一路”战略与中国国内各地开放态势联系而言，将重点涉及东北、西北、西南等边疆地区一些省区市。受历史与自然条件限制，这些地区经济发展总体水平较低，近年在国内宏观失衡调整背景下短期经济形势分化明显，比如某些东北省份经济下行压力较大，有的西北省区经济增速显著超过全国平均水平。实施共建“一带一路”战略，有望实质性改变这些地区经济发展的政策优先度与环境条件，推动中国边疆地区经济较快发展与中国区域经济结构朝更为平衡合理方向演变调整，并为应对与化解某些少数民族地区的深层矛盾产生积极影响。<sup>43</sup>至此，1988年邓小平就提出“两个大局”战略构想，预示后续我国西部大开发战略、振兴东北计划和中部崛起战略提出和实施。“一带一路”战略将推动我国区域均衡发展战略进入新阶段。<sup>44</sup>

## 4、为什么是中国？

### 4-1、美国先手棋收效不理想

2011年9月，美国提出“新丝绸之路倡议”，试图建立一个以阿富汗为中心、连接中亚和南亚、并向中东地区延伸的国际经济交通网络。在时任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描绘的图景中，“土库曼斯坦的油气田将满足巴基斯坦和印度不断增长的能源需要，为阿富汗和巴基斯坦提供可观的过境收入。塔吉克斯坦的棉花将被制成印度的布匹。阿富汗的家具和水果将出现在阿斯塔纳、孟买和更远的地方。”<sup>45</sup>韩媒有评论认为，该计划“核心内容是帮助丝绸之路所经中亚国家开发社会先行资本（SOC），帮助其实现贸易自由化。”<sup>46</sup>

客观而言，上述构想不无道理。三年多过去了，美国实施该计划以及在“中亚区域经济合作会议（CAREC）”框架下所做努力取得了一些进展，2012年《杜尚别宣言》提出一批建设项目也得到部分实施，有些项目对区域经济发展应有积极意义。然而美国实施规划在系统跟进切实有力落实行动方面仍明显不足，总体看收效并不理想。上述韩媒文章评论：希拉里的“丝绸之路”现已不见踪影，也听不到“美国正在为中亚国家的经济发展做贡献”这样的话了。

中国近年与这些国家双边与区域经济合作则更为务实与活跃推进。如2013年9月习近

---

易金融网，2015年3月3日）。

<sup>43</sup> 2015年两会期间，有关人士透露“一带一路”重大工程项目清单将比较集中在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巴基斯坦等周边国家，新疆作为国内重点承接区域。全国人大代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主席雪克来提·扎克尔发出感慨：“正在从一个过去的‘口袋底’，变成一个开放的前沿。”（朱贤佳：“一带一路重大工程清单将亮相，博鳌论坛将成宣示窗口”《上海证券报》2015年3月16日）。

<sup>44</sup> 1988年邓小平提出：“沿海地区要加快对外开放，使这个拥有两亿人口的广大地带较快地发展起来，从而带动内地更好地发展，这是一个事关大局的问题。内地要顾全这个大局。反过来，发展到一定时候，又要求沿海拿出更多力量来帮助内地发展，这也是个大局。那时沿海也要服从这个大局。”“中央要有权威”，1988年9月12日，《邓小平文选》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77-278页）。依据邓小平“两个大局”的战略构想和20世纪末中国经济（包括地区经济）发展的实际状况，1999年9月召开的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正式提出，国家要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2003年10月，发布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了实施振兴战略的指导思想和方针任务和政策措施。随着东、中、西和东北四大经济板块之间的差距逐渐缩小，2004年《政府工作报告》第一次明确提出“促进中部地区崛起”，2005年中央“十一五”规划建议中也明确提出促进中部崛起，促进中部崛起成为中央政府确立的继东部开放、西部开发和振兴东北之后的第四个区域发展战略。

<sup>45</sup> MacKenzie C. Babb “Clinton Says Building New Silk Road Is Critical for Afghanistan”, 23 September 2011 <http://iipdigital.usembassy.gov/st/english/article/2011/09/20110923170112> .

<sup>46</sup> 原载于韩国《中央日报》：“用‘一带一路’表达‘强汉盛唐’的中国梦”，2015年4月13日，转引自“外媒：习近平用‘一带一路’表达中国梦”，中国网

（<http://news.china.com/domestic/945/20150415/19529484.html>），2015年04月15日。

平主席访问哈萨克斯坦期间，两国签署 22 项经贸合作协议，总金额达 300 亿美元。<sup>47</sup> 2014 年 12 月李克强总理访问哈萨克斯坦签订 140 亿美元大单，推进两国在能源、基建、金融等各领域合作。<sup>48</sup> 2015 年 4 月 20-21 日习主席对巴基斯坦国事访问期间，更是带去价值 460 亿美元投资计划，两国在一天内签署 51 项协议和谅解备忘录，宣告 5 项重大电力工程破土动工。<sup>49</sup>

不难理解出现上述反差现象的某些原因。首先与中美两国相关政策优先序与承诺度显著差异有关。美国上述战略主要着眼点在安全领域，为美军从阿富汗撤出后做善后安排。虽然也包含经济发展规划设计内容，然而美国无心无力投入其战略设计需要的大量资源，与当年帮助欧洲战后重建的“马歇尔计划”已不可同日而语。相反，中国对于中亚及区域国家在经济及其他领域合作给予很高政策优先度，决心通过制定实施“一带一路”的“五通”规划谋求自身与沿线国家共同发展，构筑中国与区域国家的命运共同体。

另外两国与区域国家在经济互补性及契合度方面也有实质性不同。中国与很多沿线国家经济互补性较强，贸易、投资联系比较紧密，双边经济融合度较高并有进一步深化的潜力。例如习近平主席 2013 年 9 月访问土库曼斯坦时，中土两国提出要在稳定“中国—中亚”天然气 A、B 线的同时，加快 C 线的铺设，并尽早启动 D 线建设，实施好“阿姆河右岸”气田和“复兴”气田开发项目，确保 2016 年建成并通气，实现年输送气 650 亿立方米的目标。访问哈萨克斯坦时双方就共同建设石油加工厂、钾肥厂、玻璃加工厂、农业示范区等重大项目签署协议。对土、哈两国而言，中国都是第一大贸易伙伴国。<sup>50</sup> 又如中国电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截至 2014 年底，在“一带一路”沿线 21 个国家和地区承担的工程承包和投资在建项目就多达 571 个。<sup>51</sup>

美国与区域内绝大部分国家基于市场机制发生的经济联系较弱，美国重视发展与这些国家双边关系更多基于安全与军事方面原因。在这个意义上，中国与沿线国家经济关系如“鱼水关系”，美国与这些国家经济关系则更多是“油水关系”。

从更为广阔视角讨论，中国共建“一带一路”开局顺利与成效比较彰显，根本原因在于这一构想把中国大国经济崛起特定阶段的多方面优势变量聚焦到一点，通过协同效应形成破局造势的战略效果。对此可主要从两方面观察。一是就生产能力而言，中国经济现阶段在常规制造与建造方面具有很强优势与国际竞争力；二是在开放宏观经济方面，中国目前拥有最为充裕的国民储蓄与外汇储备；两方面组合条件赋予中国倡导共建“一带一路”的独特优势。实证考察有关条件及其影响，是理解“一带一路”经济逻辑的关键。

## 4-2、中国制造与中国建造

---

<sup>47</sup> 包括中石油收购哈萨克斯坦卡沙甘油田 8.33% 的股份，合同金额约为 50 亿美元，是中石油最大的一笔海外投资。参见“习近平主席中亚四国行：以新身份走访老朋友”，中国网，2013 年 9 月 13 日，[http://news.china.com.cn/world/2013-09/13/content\\_30014645.htm](http://news.china.com.cn/world/2013-09/13/content_30014645.htm)。

<sup>48</sup> 五股将开启暴涨之旅(客观形成互动!)参见“李克强与哈总统签 140 亿美元大单 五股将开启暴涨之旅”，凤凰财经综合，2014 年 12 月 15 日，[http://finance.ifeng.com/a/20141215/13356312\\_0.shtml](http://finance.ifeng.com/a/20141215/13356312_0.shtm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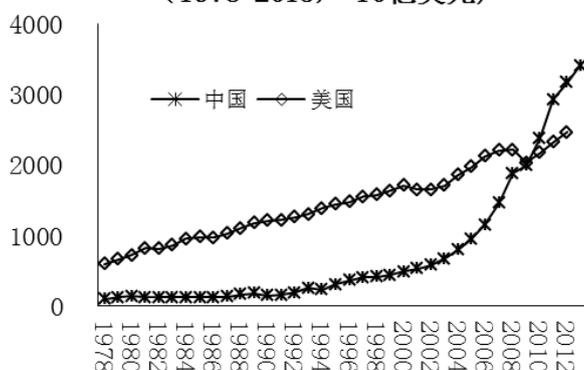
<sup>49</sup> “习近平访巴基斯坦签下 460 亿美元大单” 2015 年 4 月 22 日，环球网。

<sup>50</sup> “习近平主席中亚四国行：以新身份走访老朋友”，中国网 2013 年 9 月 13 日讯。

<sup>51</sup> 在该企业原董事长、全国政协委员范集湘看来，电力行业应充当“一带一路”战略主角。“电力比铁路、高铁更适合走出去，因为电力是必需品，而一个国家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才对高铁有旺盛需求。”他说，“在海外做项目，要对接当地的国民经济发展需要，特别是有的国家目前发展水平可能相当于我们 20 年前的水平，有的领域在我们这边过剩但他们那边却属于中高端；有些国家资源丰富，但工业配套不够，凡是电力供应不足的国家，往往水泥厂、玻璃厂、铝加工厂的产能也不够，我们要整体规划走出去”。“掘金‘一带一路’，电力成‘走出去’生力军”《证券时报》2015 年 3 月 12 日。

首先通过一组有关工业生产与制造业的国际比较数据，观察“中国制造”在全球范围重要性。图1报告用汇率折算美元衡量的中美两国工业增加值比较数据：1990年中国工业增加值规模只有最大工业国美国的12%左右，2000年仍不到美国的30%，然而2010年工业制造规模第一次超过美国，近年已经是美国的1.3倍左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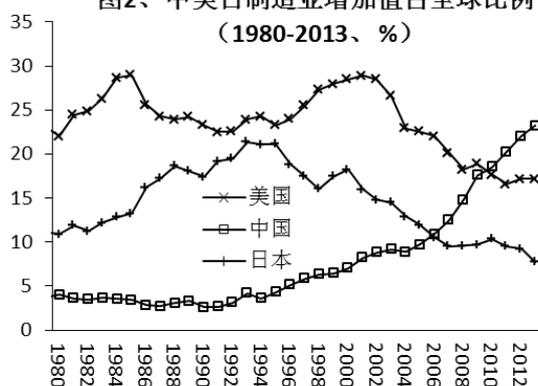
图1、中美工业增加值  
(1978-2013, 10亿美元)



数据来源：美国数据来自 BEA，中国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

图2报告中美日三个最大工业国汇率折算美元衡量的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比例。1990年代初中国占比只有5%左右，当时日本该比例值最高曾超过20%，美国在20世纪初该比例值最高曾接近30%。然而中国这一份额值从1990年代后期较快提升，2004年以后增速加快，2013年达到23%，同年美国和日本分别为17.2%和7.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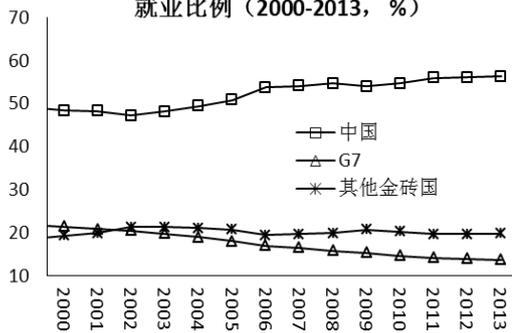
图2、中美日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比例  
(1980-2013, %)



数据来源：UN statistics。

图3报告中国、G7与其他金砖国制造业就业人数占G20国家就业总数比重。中国占比从21世纪初47%~48%上下逐步上升到2013年56.2%，同期G7同一指标值为19.3%下降到13.7%，其他金砖国大体稳定在19%上下。

图3、中国等国制造业就业占G20  
就业比例（2000-20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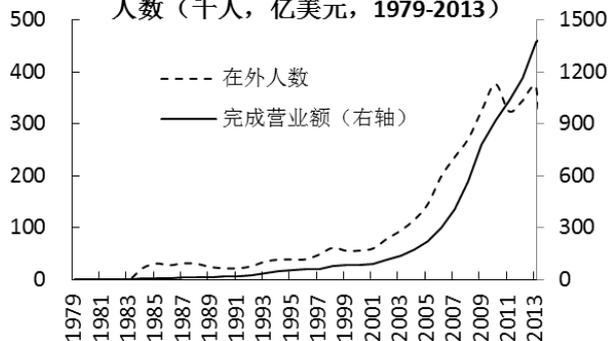


数据来源：除中国与印度外其余数据来自 ILO。印度数据根据印度中央统计组织（Central statistics organization）提供的总就业以及制造业占总就业比例计算。中国 2006—2012 年制造业就业数据为乡镇企业制造业从业人数、城镇私营制造业就业、城镇单位职工制造业就业之和，1987—2005 及 2013 年制造业就业基于二产就业人数进行估计，方法上假定制造业就业占二产就业比例与 2006—2012 年 79.95% 均值相同。

进入 21 世纪后中国工业制造与就业绝对规模与全球相对比例的持续提升，是在大体开放的全球化环境下藉由市场机制作用推动实现，显示现阶段在工业制造这个可贸易部门具有较强动态比较优势与国际竞争力。毋庸讳言，中国目前是中等收入国家，美日等国经济大体处于全球产业技术前沿，因而中国现阶段工业制造结构与美日比较仍存在很大差距。展望未来，即便在对中国经济前景较为有利假设下，上述差距可能也需要几十年持续追赶才有望逐步收敛。不过讨论本文主题更需要认识到，中国目前工业制造生产结构相对落后的某些特征属性，恰恰与“一带一路”沿线经济后进国家大规模开发阶段具体需求具有更高契合度，构成中国与这些国家共建“一带一路”的独特优势条件。

其次，观察中国对外承包工程额快速增长，可见“中国建造”的比较优势能力。图 4 数据显示，“中国建造”对外承包工程完成额，从 21 世纪初不到 100 亿美元上升到 2014 年近 1400 亿美元。从具体项目看，主要集中在轨道交通、公路、港口、码头、通讯、电力等基础设施行业<sup>52</sup>。承包工程年末在外员工数从 21 世纪初 5 万多人上升近年 30 多万人。由于“一带一路”设施联通需要强大的基建工程设计与实施建造能力支持，中国这方面的阶段性禀赋条件与能力特点，对实施“一带一路”战略同样带来重要支持作用。

图4、我国对外承包工程金额与在外  
人数（千人，亿美元，1979-2013）



数据来源：CEIC 数据库。

作为中等收入水平国家，中国工业制造一般水平与处于全球产业技术前沿国家还有不小

<sup>52</sup> RFI 研讨会简报。

差距,然而我国在某些特定领域整体能力正在迅速追赶并接近全球前沿。在少数部门和领域,如高铁技术全面整合与运用、某些重型机械制造以及大型工程建设领域,已经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尤其是中国对高铁技术的突破与逐步成熟,显著提升了商品货物与人员大范围、大规模和高速度陆地运输的效率,使得亚洲大陆内部以及欧亚大陆之间的人员、物资往来变得更为便捷有效,对实现“一带一路”美好愿景将产生重要积极作用。另外以高速铁路与公路连接的欧亚大陆桥畅通,纵横交错的大型输油输气管道的建设,使得石油等战略物资运输可以绕过直布罗陀、好望角、苏伊士运河、亚丁湾、霍尔木兹海峡、马六甲海峡等咽喉要道,显然具有超出经济利益的积极影响。

### 4-3、中国储蓄与中国储备

除生产能力方面便利条件外,中国目前拥有充裕国民储蓄与外汇储备资源,开放宏观经济领域这两方面特点对中国与沿线国家共建“一带一路”同样具有关键支撑作用。大型基础设施建设项目通常具有资金投入密集与投资周期较长特点<sup>53</sup>,发展中国家通常国内储蓄不足,因而自行解决基础设施不足短板面临很多困难。在逻辑上,国内储蓄不足可通过国际资本市场融资解决,然而由于大型基础设施投融资项目存在特殊风险,市场性融资通常难以大范围奏效。现存各类开发性国际金融机构设置和运行逻辑,一定程度上正是基于对上述特殊约束条件认识,试图利用国际机构信誉能力帮助发展中国家克服基础设施投资不足局限。从战后实践看,世界银行、亚行等国际金融机构长期努力取得了一些成绩,然而仍远不能满足广大发展中国家摆脱贫困谋求发展的现实需要。

据亚洲开发银行 2009 年一份专题研究报告估计,“在 2010—2020 年,亚洲各国国内总体需要在基础设施领域投资大约 8 万亿美元。此外还要在特定区域内基础设施项目上投资 2900 亿美元。大体是在 11 年内每年需要 7500 亿美元投资”。<sup>54</sup>非洲很多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也面临类似瓶颈约束。据估计,“要满足非洲的基础设施需求,每年需要 930 亿美元资金——这是现有水平的两倍多”<sup>55</sup>

然而,资金供应端能力与上述投资需求存在巨大反差。以全球最大发展融资机构世界银行为例,该机构 2013 年财年为全世界提供的基础设施投资只有 240 亿美元左右。<sup>56</sup>亚行近年总融资额只有 200~300 亿美元,其中较大部分要用于区域内减少贫困、教育、卫生等民生措施,投资基础设施资金规模更有限。各国政府与有关机构也在积极努力应对资金瓶颈,如 2012 年部分东盟国政府与跨国市场机构建立东南亚基础设施基金,然而其初始运营资金只有 4.85 亿美元,对于区域内巨大投资需求而言可谓杯水车薪。<sup>57</sup>世界银行一份研究报告指出:“金融危机后及其后续影响极大地限制了发展中国家从传统的、私人的和长期的渠道获得的

<sup>53</sup> 例如,“大型采掘项目的成本可能高达 30 亿至 150 亿美元,从发现到商业运行要耗费 10 年或者更久,而收回投资则还另外需要几年。”参见 Harard Halland et al.《资源融资的基础设施——关于一种新的基础设施融资模式的探讨(世界银行研究报告)》,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15 年版,第 4 页。

<sup>54</sup> 参见 ADB and ADBI,“Infrastructure for a Seamless Asia”, A joint Study of ADB and ADBI, Tokyo ADBI, 2009, 第 5 页。“其中 68%用于新基础设施能力建设,32%用于维持和重置已有设施。电力和道路分别占据总投资的 51%和 29%(第 167 页)”。

<sup>55</sup> Foster, Vivien and Cecilia Briceno-Garmendid (2010) *Africa's Infrastructure: A Time for Transformation*,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转引自, Harard Halland et al.《资源融资的基础设施——关于一种新的基础设施融资模式的探讨(世界银行研究报告)》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15 年版,第 5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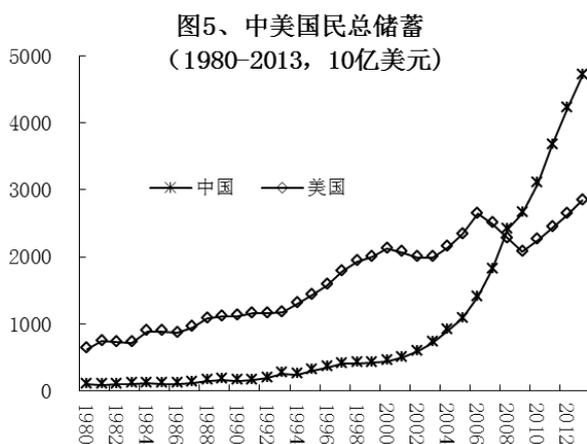
<sup>56</sup> 世界银行集团 2014 财年在准备转向新的运营模式的同时大幅增加对发展中国家的支持,从 2013 财年的 526 亿美元增至 610 亿美元。世行集团在 2014 财年(2013 年 7 月 1 日至 2014 年 6 月 30 日)基础设施融资据估计达到近 240 亿美元。(张环:“世行本财年承诺贷款额较危机前上升 65%”,金融时报,2014 年 7 月 4 日。)

<sup>57</sup> “ASEAN Infrastructure Fund to be accessible this year”, Xinhua, 2012-03-30, [http://www.chinadaily.com.cn/xinhua/2012-03-30/content\\_5577657.html](http://www.chinadaily.com.cn/xinhua/2012-03-30/content_5577657.html)。

资金，特别是用于基础设施的资金。”<sup>58</sup>

由于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需要大量先行投入与融资安排，因而在共建“一带一路”中发挥倡导与协调作用的国家，国内必先拥有充裕国民储蓄与强大资本形成能力。上述美国 2011 年提出“新丝绸之路倡议”，也看到中亚国家需要大规模“社会先行资本（SOC）”，然而要切实帮助这些国家大规模形成 SOC，美国不仅政策优先度不足，并且缺乏大规模转移储蓄与帮助投资的实际能力。有观察人士认为，美国国内基础设施也亟需大规模更新投资，并且很可能需要来自中国的合作。<sup>59</sup>

由于人口结构和发展阶段特点，中国目前宏观经济结构呈现高储蓄高投资特点，最有能力协助广大发展中国家缓解储蓄与投资能力不足的瓶颈制约。图 5 报告中国用汇率折算美元衡量国民储蓄规模并与美国比较，显示本世纪初中国国民储蓄总规模只有美国两成左右，2008 年第一次超过美国，2013 年已超过美国约 65%。如果考虑美国资本存量规模较大因而资本折旧较多，中国国民净储蓄规模超出美国比例要来得更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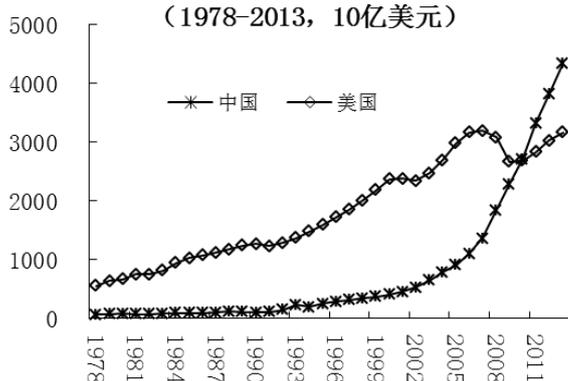
数据来源：IMF WEO (2014 Oct)

高储蓄支持中国高投资能力。图 6 报告中美两国资本形成规模比较数据，显示 21 世纪初中国用汇率折算衡量的资本形成规模也只有美国的 1/5 上下，然而 2010 年中国资本形成规模第一次超过美国，2013 年约是美国 1.37 倍。中国有能力在保持国内投资需求较快增长同时，帮助沿线国家进行大规模的基础设施投资，推进共建“一带一路”建设。

<sup>58</sup> Harard Halland et al. 《资源融资的基础设施——关于一种新的基础设施融资模式的探讨（世界银行研究报告）》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15 年版，第 5 页。

<sup>59</sup> 如摩根大通亚太区副主席李晶女士提到：“前段时间我在美国大使馆参加一个活动，美国大使说美国电网、铁路、公路的老化问题很严重，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建设，所以他们非常欢迎中国的资本去投资。”她表示，其在欧洲、美国、澳大利亚与当地政府交流后发现，由于中国国企在铁路、公路、桥梁等大型基础设施方面具备技术和效率上的优势，大多数发达国家欢迎中国国企在其市场上进行投资。参见“中国有 2 万多家企业在海外投资 90% 以上亏损”，《国际金融报》，2015 年 2 月 9 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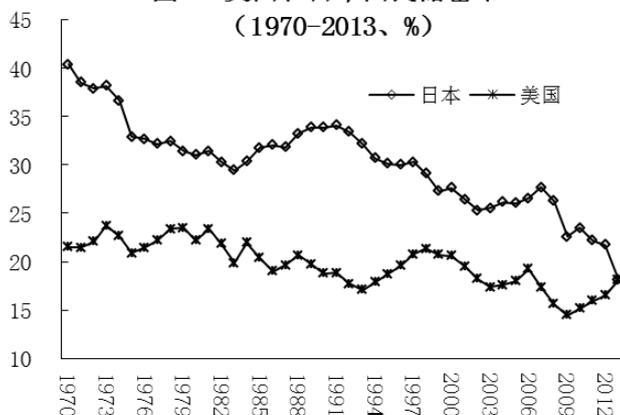
图6、中美固定资本形成  
(1978-2013, 10亿美元)



数据来源：美国数据来自 BEA，中国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

作为比较，美国和日本总体而言都面临国民储蓄率趋势下降问题。图 7 数据显示。2013 年美国和日本储蓄率都已降到约 18%。依据对美国与日本资本产出比、资本存量、资本折旧等宏观经济指标的估测，两国即便把所有储蓄都变成国内投资，也难以实现资本净投资及资本存量较快增长。日本资本产出比较高，或许已进入资本存量总规模停滞不前甚至边际下降状态，构成日本经济落入“低增长稳态”的重要推手<sup>60</sup>。储蓄率偏低与固定投资不足，是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目前比较普遍面临的宏观经济约束，是决定上述全球经济增长重心转出发达国家的深层结构因素。这一背景下，美国自然没有很多余力帮助发展中国家大规模投资发展。

图7、美国和日本国民储蓄率  
(1970-2013, %)



数据来源：美国数据来自 BEA，日本数据来自 Japan statistics bureau。

另外，中国拥有全球单个国家最大规模外汇储备也是一项重要有利条件。给定现行国际货币体系背景，拥有数量充裕、甚至从某种优化标准而言规模偏大的外汇储备资产，客观上对推进“一带一路”经济外交战略有两方面支持作用。一是在当今发达国家争先恐后地实施超宽松货币政策积累金融风险形势下，大规模外汇储备有助于应对外部金融形势动荡可能带来的冲击，保证“一带一路”战略实施及相应投融资计划实施具有内生稳定性。二是在区域内货币仍未普遍国际使用前提下，美元仍承担国际结算和支付手段。在有关工程项目需要在

<sup>60</sup> 卢锋：“减速与调整：全球宏观经济形势研判”《大国追赶的经济学观察：理解中国开放宏观经济（2003-2013）》，下册，第 907-948 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 年版。

区域外国家配套采购场合，美元提供的国际支付流动性更是不可缺少。

不过外汇储备在这里作用可能没有一般想象得那么大。中国与沿线国家的工业制造部门，对“一带一路”投资项目所需资本品与其他设备材料具有比较系统完整的配套供应能力，通常情况下共建“一带一路”项目对储备资产终极需求可能比较有限。随着区域内经济发展及其对区域外较高端或其他特殊产品总体进口替代能力提升，随着“一带一路”推进区域内货币国际使用程度提升，外汇储备的上述功能重要性将呈现下降趋势。充裕外汇储备是支持“一带一路”的重要变量，然而一国外汇储备是国民储蓄的转化形式，就对本文讨论问题重要性而言，中国拥有充裕国民储蓄应是第一位的，外汇储备支持作用是第二位的。

实施共建“一带一路”战略意味着中国利用国民储蓄方式可能逐步发生转折性变化。21世纪初中国经济快速追赶，然而受制于汇率改革滞后与高储蓄率背后结构性因素，中国积累了海量规模的外汇储备。增持外汇储备的经济含义，相当于中国不断把储蓄借给供应储备资产的债务国，伴随中国对美国等发达国家过量债权积累。这个运行模式对危机前中国以至全球经济快速增长发挥了一定支持作用，然而后危机时代越发显示其不可持续性。共建“一带一路”与结构调整，意味着中国富余储蓄今后将较多转化为在沿线发展中国家的生产性投资，<sup>61</sup>由此派生中国国民储蓄在全球范围配置方式的重大调整。<sup>62</sup>

#### 4.4、合作共赢的经济逻辑

共建“一带一路”作为中国提出的战略愿景与规划，其具体政策设计与实施方案必然包含复杂内容与细节。然而至繁之事必有至简之理。以“为什么是中国”为题，从各国发展诉求与中国独特基本面条件对接视角观察，“一带一路”折射出清晰的经济逻辑。什么是发展？如何致力于发展？开放环境对发展有何影响？分析“一带一路”对理解上述发展经济学的重要问题具有启示作用。

后进国家经济结构通常有类似表现：如基础设施条件差，资源开发能力弱，体制政策效

<sup>61</sup> “有贸易顺差就可能会有储备积累，储备积累要么在国家手里，要么在民间。在国家手里，要走出去，在民间手里，民间也会走出去，这是同一道理。与此同时，人民币国际化的势头也开始了。这时，就出现了新情况，多出来的储蓄可以不表现为外汇顺差收入导致的储备积累，而是直接以人民币的形式走出去，这中间会有一部分人民币对外汇的替代。不过，目前总体来看，大逻辑还是从储蓄偏多到国际收支顺差，然后到外汇积累（包括民间和官方），然后是外汇走出去投资的扩大，这是主线。中国的一大特点是储蓄率高，这有一系列的原因，有人解释为预防性储蓄，有人解释为文化价值观所致。储蓄率高，一部分资金就会走出去，外汇储备就要走出去。这是由宏观经济恒等式决定的：储蓄多，要么用于国内投资，要么用在海外投资，其中包括外汇储备的运用。外汇储备往往是通过净出口的差额积累而来，从宏观经济恒等式看，其根源之一是储蓄率高。全球金融危机期间，有人批评我们储蓄过剩，这个批评是否成立暂且不论，储蓄率高有其长处也有短处，但这是不是最佳选择、是不是最佳资源配置？取决于你的宏观经济分析框架。既然储蓄率已偏高，外汇储备比较多，而且也不是短期能够改变的，就需要有一部分用于走出去，把资金拿到国外运用，这就是丝路基金要做的事。”（周小川：“丝路基金起步运作，不是中国版马歇尔计划”，《第一财经日报》，2015年2月16日）。

<sup>62</sup> 根据2015年4月7日彭博汇编数据，2015年3月份全球外汇储备从2014年8月份创纪录水平的12.03万亿美元下降至11.6万亿美元，止住了2004年开始激增4倍的势头。虽然美元升值造成其他储备货币价值缩水可能夸大了降幅，过去十年外汇储备平均每年增加8240亿美元形势正在发生转变（“外媒：全球外储十年来首次下跌 因中国等抛售美元储备”，2015年4月7日，来源：凤凰财经综合）。虽然上述变化是不是趋势性逆转还有待观察，共建“一带一路”最终可能对21世纪初年全球储备资产的大幅激增产生显著抑制作用。另外研究人员注意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很多发展中国家储蓄不足，但是也有包括中东产油国在内的少数国家，拥有大量外汇储备，“占主权财富70%左右”。但是，这些资金因为缺乏区域性金融合作的机制和平台，被投放到发达国家的金融市场上去了，没有转化为这个地区自身发展的资金来源。共建“一带一路”为这部分资源更有效利用提供新契机。（马玉荣、王艺璇：“‘一带一路’一大国发展战略——专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隆国强”，《中国经济报告》，2015年4月29日）。

率低，熟练工人和各类人才缺乏等等。一国经济进入快速成长通道，根本动力当然是自身努力和内因作用，国内体制政策选择尤其是关键变量，然而符合规律与切实有效的外部合作，也能对突破贫困陷阱并进入起飞状态发挥重要助推作用。上面讨论显示，与发展阶段相联系的组合特点和优势，使得中国有可能通过倡导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努力，为沿线国家提供全新发展契机。

凭借制造与建造方面的出色能力，中国能为经济后进国家提供性价比最好的基础设施建设解决方案；借助阶段性充裕的国民储蓄和外汇储备资源，中国能有效帮助沿线共建国家超越储蓄与贸易的“双缺口”制约；中国部分劳动密集型产业、产品或区段随着国内要素价格上升，会在市场机制和比较优势规律作用下逐步向国外转移，为沿线承接转移国家提供非农就业、提升人力资本、发挥自身比较优势的合作机遇；中国与有关国家共享改革发展经验，将为沿线国家体制与政策诱致性改革变迁提供善意有效的推动力。当然，“一带一路”并非仅限于中国与相关国家的双边关系，而是涵盖沿线国家相互之间合作内容，是区域合作规划和行动。不过中国作为最大新兴经济体，无疑将在其中发挥特殊作用。共建“一带一路”，中国将有机会向世人展示自己是最好的发展合作伙伴，中国也将从中获得广泛利益。

## 5、“一带一路”的影响、风险与应对

推进“一路一带”建设对中国与沿线国家可谓功在当前利在长远，同时这项宏大事业也必然会面临各种困难和阻力。

就经济逻辑观察，“一带一路”有望带来多方面积极影响。第一，将为中国经济开拓创造更具全方位特点的开放格局。早先中国处于产业链低端，在产品内分工时代通过加工贸易参与国际分工，主要表现为承接发达国家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发达国家输出加工品。经过几十年开放发展历练，中国已成功转变为中等收入水平国家，未来经济发展与结构提升对开放格局提出更高要求。未来中国与发达国家经济仍有很多扩大合作领域空间，同时与新兴经济体及广大发展中国家经济合作重要性将会显著提升。共建“一带一路”是中国“构建全方位开放新格局，深度融入世界经济体系”<sup>63</sup>的重大部署，也是“开展更大范围、更高水平、更深层次的区域合作，共同打造开放、包容、均衡、普惠的区域经济合作架构”<sup>64</sup>的战略举措。

第二，创造培育国内、区域以至全球范围的新经济增长点。在中国宏观经济面临周期调整下行压力形势下，结合共建规划适当追加国内相关地区与行业配套投资，有助于国内经济短期稳增长目标并将对长期增长发挥积极作用。<sup>65</sup>“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由于受到基础设施缺乏等硬件条件与体制政策不完善等软件条件制约，发展潜力未能得到充分释放。共建“一带一路”对症下药，有助于中国与沿线国家更好实现经济较快可持续发展目标，并对培育全球经济新增长点做出贡献。

第三，改进与完善国际经济与金融治理架构。目前全球经济治理结构与全球化深化要求不匹配，要把 21 世纪经济全球化提升到更高水平，亟需改进完善全球治理结构。在 IMF 份额调整受阻与守成大国对全球治理架构“存量改革”消极拖延形势下，新兴经济体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用建设性方式主动进行“增量改革”具有重要意义。中国倡导共建“一带一路”探索合作发展新路径，本身具有对现存治理结构在有效解决当代发展问题局限性方面提出质疑

<sup>63</sup> 国家发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务部：“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国家发展改革委网站，2015 年 3 月 28 日，[http://www.sdpc.gov.cn/gzdt/201503/t20150328\\_669091.html](http://www.sdpc.gov.cn/gzdt/201503/t20150328_669091.html)。

<sup>64</sup> 同上。

<sup>65</sup> 据市场研究机构估计“各省 2015 年两会政府工作报告上关于‘一带一路’基建投资项目总规模已经达到 1.04 万亿。从项目分布看，主要以‘铁公基’为主，占到全部投资的 68.8%。”（李秀中：“地方掘金一带一路，基建投资逾万亿”，《第一财经日报》，2015 年 3 月 26 日）。

补救的含义，依托“一带一路”建设成立亚投行等新金融机构更是重大“增量改革”举措，将对改进完善现有体系产生深远影响。

第四，推进人民币国际使用的历史进程。随着全球经济格局与主要经济体相对经济实力演变，国际货币体系与特定主权国家货币的国际地位终究会发生相应调整，二者变化虽然并非在每个时点都具有成比例一致性，然而终究会通过非线性方式实现其内在一致性要求。伴随中国开放经济体量增大及其在全球经济体系中相对地位提升，人民币在国际交易范围逐步增加使用应是大势所趋。本币国际化本质上是大国经济开放成长的自然历史过程，并且对货币发行国意味着责任和担当，因而它不应是短期政策目标，甚至也不是可以选择的政策工具。共建“一带一路”将探索使用区域内货币进行贸易结算与发债融资等金融货币合作途径<sup>66</sup>，中国作为共建“一带一路”倡导国，人民币国际使用将获得前所未有机遇。

第五，改善外部资产负债与收支结构。伴随经济追赶提速与加深融入全球经济体系，中国对外资产负债表快速扩大。国际投资头寸数据显示，中国对外资产从2004年9291亿美元上升到2014年64087亿美元，同期对外负债从6527亿美元上升到46323亿美元，净资产从2764亿美元升到17764亿美元。<sup>67</sup>然而中国对外资产负债结构不合意，虽拥有巨额净资产却遭遇净值负收益。例如2014年数据显示，中国对外资产61%是低收益外汇储备，对外负债58%是外商高收益直接投资，“国际收支平衡表中投资收益为逆差599亿美元，……二者收益率差异为一2.7个百分点”<sup>68</sup>。给定人民币实际汇率升值趋势，最终用人民币衡量的净收益负值可能更大。“一带一路”建设将拓宽中国以非外汇储备形式持有外部股权债权空间，有利于提高中国储蓄在国外配置效率以造福于沿线国家经济发展与民生改善，也有助于改善中国对外资产负债结构。

共建“一带一路”必然会面临各种困难与风险。第一，共建“一带一路”会始终面临如何处理与大国关系的难题。例如，美国作为现有国际秩序的主要创设国和主导国，显然会较多从竞争角度看待共建“一带一路”这个新变化，美国对亚投行反应已显示这一点，不过中美在有关领域仍有很多合作空间，美国有关政策未来变化不确定性最大<sup>69</sup>。由于众所周知的历史与地缘政治原因，俄罗斯对“一带一路”会有复杂感受与反应，共建“一带一路”如何协调与俄罗斯这个重要战略伙伴国关系会具有特殊敏感性与微妙性。欧洲大国、印度等与中国在共建“一带一路”上有较多合作空间与意愿，不过也会在地缘政治与具体合作方式上存在很多立场差异与磨合之处。日本估计会更多从消极方面看待“一带一路”，不过日本与不少沿线国家经贸援助关系与“一带一路”在客观上也不无交集。大国崛起如何管理大国关系演变始终是难点，共建“一带一路”越是取得成效，由其激活的潜在风险因素可能会更大，

<sup>66</sup> 业内人士认为，“东亚各经济体在产业结构上与我国存在较大互补性，贸易往来频繁，构成了人民币跨境流通的基础。现在，人民币已经成为周边国家和地区贸易的主要结算货币，并在东南亚区域内贸易中表现出较好的可接受性，说明人民币作为区域贸易国际结算货币的市场需求已经基本形成。”“我国与沿线国家的人民币跨境使用已初具成效。自2012年6月首笔人民币兑哈萨克斯坦坚戈交易的国际贸易结算实现以来，2013年国家开发银行新疆分行向哈萨克斯坦企业发放人民币贷款3.5亿元，实现我国对中亚人民币输出的重大突破。我国境内的新疆霍尔果斯口岸积极实践人民币跨境业务创新，2013年8月，中哈霍尔果斯国际边境合作中心成为全国首个“境内关外”离岸人民币创新金融业务试点区，享受比深圳前海、上海自贸区更优惠的特殊离岸人民币政策。在该合作中心内，人民币可与周边国家货币自由兑换、挂牌交易，开展人民币融资业务。”（庞凌子：“人民币国际化护航一带一路，规避美元汇率风险”，和讯网，2015年3月17日）。

<sup>67</sup> “中国国际投资头寸表（年度表）”，中国外汇管理局网站（<http://www.safe.gov.cn/>）。

<sup>68</sup> 国家外汇管理局国际收支分析小组：《2014年中国国际收支报告》，2015年3月31日。

<sup>69</sup> 本文第一作者2015年元月随团访问美国政府有关部门，一位官员指出中美在东南亚与中中亚存在广泛合作空间。在他看来，美国有南北丝绸之路倡议而中国有东西丝绸之路倡议，美国有“印太经济走廊”倡议而中国有海上丝绸之路倡议，美国协调各国海关标准方面具有一流软实力，中国基础设施建设具有一流硬实力，中美两国都重视基础设施并致力于区域互联互通，两国存在巨大合作潜力。

在某种意义上“一带一路”给中国提供了一次充满挑战的“主场”历练机会。

第二，如何处理沿线小国关系也会面临复杂难题。沿线国家中像巴基斯坦这样全天候好伙伴并不多。如菲律宾、越南这样近年与中国双边关系出现特殊困难的国家也积极参与创设亚投行，显示共建“一带一路”互利共赢性质及由此派生的生命力与影响力，然而与这些国家具体合作仍可能会多一些制约因素和困难。又如由于不很久远的历史原因，蒙古国参与共建“一带一路”难免会多一些考量。即便是历史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总体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希望搭乘中国经济崛起快车以实现自身发展抱负，然而如有关专家客观指出的：“今天一路一带上的许多国家尤其是小国，在古代丝绸之路的时候，并不是我们平等的伙伴而是我们的藩属。丝路时代的回忆对于他们来说，可能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样美好”。<sup>70</sup>历史记忆中不美好因素，也可能转化为影响合作的交易成本。

第三，工程与项目实施层面会有更多困难与风险。21世纪以来中国大量企业走出去曾面临的各类困难，都会构成共建“一带一路”的潜在和现实挑战。一是体制政策风险。沿线发展中国家即便在政治层面明确了合作立场，在体制与政策层面仍可能存在大量协调困难，例如特定项目用地能否及时到位，过于繁复的海关检验程序能否得到合理控制，汇率波动与外汇管制可能发生突然变动等，都会给本来可能互利共赢项目蒙上阴影。

二是管理风险。中国企业走出去在国外面临全新的社会、经济、政治、法律、文化环境，在生产流程、质量控制、员工管理等方面都会遇到新困难，简单采用国内行之有效方法可能会“水土不服”。这就要求中国有关企业在管理运营层面认真学习善于学习，尽快适应所在国特定环境以保证平顺运营，为共建“一带一路”提供企业微观面支持。

三是环境风险。大型基础建设与工业投资项目必然伴随对自然生态环境系统的某种人为干预，受到技术可行性、预期赢利性与环境可持续性三重变量的相互制约。虽然保护环境与重视生态文明建设是共建“一带一路”基本方针之一，在具体工程项目设计和实施层面如何统筹兼顾各方面目标达到最佳平衡，仍会面临选择困难甚至会有争议。

四是经济形势与政局变动风险。中国企业近年国外投资，经常遭遇经济形势变化导致已确定项目搁浅取消的冲击。去年国际油价下跌在一些国家引发这类情况。如中资企业主导财团在墨西哥投标获得一个规模达数十亿美元的高铁项目，今年初被墨西哥政府以经济形势变化为由取消是一个事例。<sup>71</sup>另外，投资国执政党轮替，或政局动荡甚至爆发内战，都可能对已确定或在建项目带来颠覆性影响，<sup>72</sup>甚至对我设备财产甚至人员生命带来威胁。

第四，企业是共建“一带一路”的中坚力量。打铁先要本身硬，中国企业和机构大规模走出去同时，如何把握好经济效益与社会责任关系，做到技术过硬、管理到位、效益良好、美誉度高，将是决定未来成败的关键。另外因共建“一带一路”创设的亚投行、丝路基金如何在自身决策机制与管理方面贯彻市场化、国际化、专业化原则，如何在实施项目层面坚持自身特色定位又与现有相关国际金融与发展机构有效合作，内部运行如何结合利用投票与协

<sup>70</sup> 储殷：“一路一带战略的实现需要更冷静的思考”，中国网-观点中国，2015年1月18日，[http://opinion.china.com.cn/opinion\\_92\\_119792.html](http://opinion.china.com.cn/opinion_92_119792.html)。

<sup>71</sup> 杨宁昱：“路透：墨西哥取消两个中资项目令中企‘心凉’”，参考消息网，2015年4月22日，<http://finance.cankaoxiaoxi.com/2015/0422/751667.shtml>。

<sup>72</sup> 在某种程度上这是跨国基础设施投资面临的普遍约束和风险。例如据抽样研究，“在1985-2000年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国家达成的1000项基础设施特许经营授权中，有30%在2.2年内就重新进行了谈判，重新谈判比例最高的是有关谁和环境卫生方面的特许经营授权，达到74%。[原载于Guasch J. Luis, 2004, *Granting and Renegotiating Infrastructure Concession: Doing It Right*,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转引自：“林毅夫和王燕的评论”，Harard Halland et al. 《资源融资的基础设施——关于一种新的基础设施融资模式的探讨（世界银行研究报告）》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15年版，第73页。]

商机制达到既高效决策又充分集思广益，都存在需要通过实践探索逐步解决的问题。

第五，如何正确看待实施“一带一路”战略与国内深化改革推动体制转型关系也可能存在认识风险。亚投行冲击显示中国改革发展阶段性成就与影响力提升，国内媒体热议时扬眉吐气与欢欣鼓舞是大国崛起阶段的正常合理心态。不过也需防范公共兴奋与欣慰感可能传导一种潜在认识偏颇，就是把亚投行冲击解读为“中国模式”大功告成而盲目乐观，把共建“一带一路”开局顺利看作是所谓“北京共识”对“华盛顿共识”的完胜而淡忘国内改革大业仍面临爬坡过坎与壮士断腕的挑战。改革开放激活创造力是中国发展成就的根本原因，中国也是战后经济全球化体系与秩序建设的参与者与受益者，倡导“一带一路”并非意在颠覆现有经济秩序，也不是仅追求中国自身利益，而是要与沿线国家一起依据各自国情改革开放，探索共同发展与互利共赢道路。

共建“一带一路”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事业。中国应对挑战、克服困难、争取共建“一带一路”成功，是对新时期中国奋发有为新外交方针的检验，也是对中国作为最大新兴经济体引领发展潮流能力的检验。共建“一带一路”事业能否取得预期成功，根本保障条件在于中国能否通过全面深化改革解决建构完善国内市场经济体制的挑战，在于能否通过全面依法治国建成现代国家治理架构与能力，在于能否保持中国经济持续追赶从而为“一带一路”合作提供生生不已动力并动态充实其内涵。在这个意义上，“一带一路”成功条件在这个战略本身之外。

要长期坚持“亲诚惠容”、合作共赢的基本方针，通过持久合作努力逐步实现规划目标，由此获得国际社会更广泛诚挚的认同。中国企业走出去要找准定位，谋而后动，发挥核心竞争力，避免一哄而起一拥而上。项目设计实施需重视兼顾市场赢利与社会责任目标，避免短期行为与竭泽而渔。要重视劳动密集型制造业有序转移，充分发挥这类转移对承接国在就业和经济发展方面的积极作用和特殊影响。项目设计实施应加强与国际机构与发达国家有关机构的务实合作，学习借鉴行之有效的国际经验和方法。要把培训、学位教学与实践高效结合起来，大力培养各个层次各种类型人才。总之，共建“一带一路”无捷径可走，只能通过持久而正确的努力，才能最终实现中国与沿线国家携手共进谋发展、百花齐放春满园的愿景。